

近代以来宁波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分析

蔡 罕

摘 要：将近代以来宁波的新闻事业分三个历史时期进行探究。1854年至1918年是宁波创立近代新闻事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中，在甬外报的创办、宁波人自办报刊的发轫与辛亥革命前后宁波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出现，构成了这一时期宁波事业发展的主线；1919年至1927年，宁波的新闻事业与当时高涨的革命形势一样，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新气象，宁波的新闻事业由此迈入了兴盛期；1927年至1949年，国共两党各自发展新闻事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抗日战争中斗争、合作。与此同时，宁波民营新闻事业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博弈中，不断发展并趋于成熟。

关键词：宁波；宁波新闻史；新闻事业

作者简介：蔡罕，男，教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教务处，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1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1-0018-08

一、1854—1918年宁波的新闻事业

（一）在甬外报的创办

从1854年到19世纪末，在甬外报主要有《中外新报》（1845-1861）、《宁波日报》（1870）、《甬报》（1881-1882）、《德商甬报》（1898）等。从《中外新报》到《德商甬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甬外报呈现着诸多的变化和发展。

首先，在甬外报的办报主体经历着由传教士创办到中外合办的过程。早期在甬外报《中外新报》、《宁波日报》创办者是清一色的传教士。而1881年出版的《甬报》，在名义上则是由英国牧师阚斐迪携手宁郡太守李小池创办，并聘请慈溪人徐漪园担任主笔。创办于1898年的《德商甬报》也聘请慈溪人王恭寿为总编辑。

其二，在甬外报的传播内容也有不同的变化。早期在甬外报具有较明显的宗教色彩，如《中外新报》提出“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而《甬报》却只字不涉宗教宣传，它以“客观”、“公正”的新闻观相标榜，力图将《甬报》办成“雅俗共赏”、“家家可购”的“能广行之”的读物。这反映出至19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统治的稳固，他们已毋须借助“宗教”的力量进行殖民活动，而是联合地方官员，躲在幕后，暗中指使地方文人按照他们的“旨意”行事。

其三，《德商甬报》则在办报的理念、报纸的形式、报道的内容和经营的方式上均比《甬报》先进。德国人白廌斯创办《德商甬报》的目的则是为了德国洋行适应宁波作为商业大埠的信息传播需要。从报纸的形式上看，《德商甬报》是一份正式的近代报纸，先前的《中外新报》、《甬报》则是采用线装书的形式，更像是一种期刊；就报纸的内容而言，《德商甬报》以报道社会新闻、市价行情为主，反复议论发展商业，繁荣经济的重要，主张提高商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报刊的经营上，该报靠增加“告白”（商业性广告），来维持报纸的正常出版与运营。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商甬报》开创了宁波商

业报刊的先河。

在甬外报的出现，是在不平等的“五口通商”背景下，宁波备遭西方列强殖民文化侵略的产物。但是，近代报刊毕竟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不仅开风气之先，带来了西方先进的传播媒介，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制度和管理经验，为封闭已久的宁波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和开发民智的窗口，而且也使宁波人看到了报纸在迅速传递信息和制造舆论上的作用。不久，宁波人就走上了自主办报的发展之路。

（二）宁波人自办报刊的发端与初步发展

宁波人自办报刊的第一站是在上海。1903年11月，曾赴日本留学的慈溪人陈训正在上海创办了《宁波白话报》。这是甬人独立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刊。

宁波人在本土的自办报刊略晚于上海的《宁波白话报》，其中有两份报刊值得我们关注。一份是《宁波新报》，它创刊于1906年4月，主编为袁荷龄（一说“洪佛矢”），一年左右即停刊。另一份是由甬上名流张让三于1908年创办的《甬报》，出刊约四个月后即停办。两份报纸存世短暂的原因可能与当时宁波受上海报业影响，本土报刊缺乏读者市场有关。20世纪初上海已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工商业都市，这也使得上海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中心。宁波靠近上海，因此上海报纸对宁波的影响就非常大。这使当时甬人订报，多选上海《申报》，宁波本地报纸反而受到冷落。

直到1910年《四明日报》的创办才改变了这种局面。《四明日报》从创办到停刊，共持续了17年，成为宁波本地第一张有较大影响的民营商业性报纸。从辛亥革命前夕到“五四”运动之前的10年间，宁波除《四明日报》外，先后还出现不下20种的报刊，如《方闻报》、《堇江潮》、《明州繁华报》、《兰江报》、《小甬报》等，但大都昙花一现，唯独《四明日报》特立独行，“成为宁波舆论权威，社会骄子”^[1]。究其原因，主要是《四明日报》的经营不单靠地方财团的支持和报纸发行的收入，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去拉广告，扩大报社的经济来源。从另一方面来看，民国初期宁波本土的工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近代城市文化开始涵育，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宁波的各行各业和民众都有发布相应的广告和获取相关新闻信息的需求。这就使得宁波本土报纸具备了商业化运作的客观条件，并促使宁波自办报刊开始走上发展之路。

（三）辛亥革命前后宁波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出现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同盟会甬籍会员在上海和宁波创办了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报刊，如1910年汤寿潜、陈训正在上海创办《天铎报》。在宁波，陈训正、范贤方等同盟会会员于1911年9月创办了《武风鼓歙》，它以“阐明武德，激扬武风”为办刊宗旨，提倡练武救国，激发同仇敌忾之革命意志，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此外，还有1911年6月天恨（应彦开）创办的《朔望报》。

辛亥革命后，宁波的同盟会会员卢浩、钱衍等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怒潮中，纠合同志，于1915年创办了《浙东公报》。该报鼓吹民权，笔伐奸佞，敢于揭露和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丑行与卖国阴谋，唤起广大革命党人和进步民众积极投入反袁斗争的行列之中。

宁波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所创办的一系列政党报刊，以言论见长，其文章以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宣传革命动态、唤起民众的爱国激情、宣扬民权和针砭时弊为主要内容，这对于宁波辛亥光复运动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光复后宁波军政分府的各项工作的开展起着有力的服务和支持作用，对于宁波开展反袁复辟、拥戴民国的斗争起着重要的舆论导向和宣传作用。在当时，《武风鼓歙》等政党报，宁波各界人士、青年学生，莫不争相订购，先睹为快，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这为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国民革命在宁波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与文化基础。

二、1919—1927年宁波的新闻事业

（一）“五四”运动影响下的宁波新闻

1919年5月7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宁波，甬城的青年学生、店员工人们奋起响应，成立了“宁波学生联合会”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组织，他们揭露奸商，抵制日货。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宁波的新闻事业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首先，各种爱国报刊应运而生。“宁波学生联合会”创办了《宁波学生联合会周刊》，效实中学学生会自助会编印了《效实中学生自助会周刊》。至1919年下半年，仅半年时间，宁波就先后出现了《救国》、《良心》、《民意》、《火花》、《天鸣》、《救国要览》等白话刊物。这些报刊宣传爱国排日，提倡科学民主，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第二，《四明日报》一改平素“水火盗贼报”的作风，在进步青年乌一蝶的主持下，一度成为甬城排日运动的舆论阵地。

第三，宁波的青年知识分子建立了自己的舆论基地——《时事公报》。该报奉行救国团“爱国抵货”的宗旨，高举反帝爱国的大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时事公报》还一度在副刊为宁波的青年知识分子谢传茂、潘念之等传播马克思主义开了绿灯。^{[2](24)}

第四，宁波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创办自己的报刊。1919年11月《宁波工厂周刊》创刊，该刊从谋求民族资本自身发展的目的出发，打出了“振兴工业”的旗号，反映了当时宁波民族资产阶级对时局的态度。

第五，开始出现了由各种进步团体组织所创办的文艺报刊。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宁波的青年学生也闻风而起，他们纷纷组织起文学与进步团体，创办了各种报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其中主要的有1923年4月由“春风学社”编辑出版的《春风周刊》；1923年7月由“剡社”创办的《新奉化》年刊。这些刊物对于新文化运动在宁波的开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大革命时期宁波报刊活动的蓬勃发展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革命随之进入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宁波的各种政党和群众报刊也相继创办，它们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与持不同政见的报刊展开论战。

首先，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报刊在宁波开始发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宁波评论》和《火曜》等。

第二，宁波国民党报刊在中共党员的鼎力支持下也开始创办。1926年7月15日，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早期机关刊物《甬江潮》创刊，它由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常务委员蒋本菁（共产党员）任主编。这标志着国民党报刊在宁波正式发轫。该刊虽然仅出一期，但它喊出了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混战、声援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正义呼声。1927年北伐军入浙，宁波国民党由地下状态转为公开。3月1日，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创刊。这些国民党报刊均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宁波宣传战线上的结晶。

第三，其他各色政治派别也创办了相应的舆论阵地，其中以李瑄卿、陈东荪等为首的“新国家主义派”在宁波比较有影响。1925年，他们窃据《四明日报》，作为宣传国家主义思想的舆论阵地。北伐军入浙后，李瑄卿把持下的《四明日报》被宁波市国民党取缔停刊。

第四，大革命时期，主张新文化和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报刊、图书在宁波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各类民众报刊也纷纷涌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步报刊在宁波各校的师生中广为传播，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种进步组织、社团所出版的刊

物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方阵地。当时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出现的各种进步学生刊物多达30余种，这些刊物对于宣传马列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提高青年学生觉悟起过积极的作用。

二是宁波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所办的文艺刊物、进步报刊也令人瞩目。中国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于1924年7月创办了同人刊物《我们》，第一辑《我们的七月》在宁波编定，由上海亚东书局出版。这是宁波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此外，还有张超主编的《月霞》，乌一蝶主编的《苍蝇》，宁波氛星社出版的《春光》，余姚楼适夷、郭静唐创办的《余姚青年》、《余姚评论》，奉化肖王庙“桃源社”创办的《桃源》，王任叔主编的《锦溪》，镇海李仲瑜主编的《浹滨旬报》等，都是当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抨击时弊的进步报刊。

三是宁波的工人报刊、妇女报刊也崭露头角，发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呼声。1925年5月1日，宁波钩和印刷公司的印刷工人集资创办了《劳星》月刊；1927年1月8日，《宁波妇女》问世；4月7日，宁波总工会创刊《宁波工人》，第一期编发了《工人应有之觉悟》、《帝国主义者的反攻计划》等。但此时距离大革命的失败已为期不远。

（三）民营商业性报纸的此长彼消与缓慢发展

在“五四”运动之后至大革命时期，除上述《时事公报》之外，宁波还有许多新的民营商业性报刊出现，但大多持续不久，呈此长彼消之势。譬如，1919年出版的《明州报》与1920年创刊的《宁波小报》，都昙花一现，无足轻重；1922年问世的《宁波新报》，因销数不大，不到一年即停刊；《宁波商报》于1925年12月创刊后，曾自置印刷机，日出3大张，但也终因发行量少，于1926年4月停刊。这一时期，宁属各县的商业性报刊也开始出现，但持续时间也同样不长，如《慈溪周报》（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姚江周报》（1923年冬至1927年4月）等。

虽然各种民营商业报纸立足不稳，发展困难，但金臻庠创办的《时事公报》却一枝独秀。1920年6月《时事公报》创办后，因地方新闻内容丰富，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有重要消息及时报道，因此受到了广大读者欢迎，销数不断增长，并一度造成上海的报纸在宁波发行数骤减，“《申报》减百分之六七，《新闻报》减百分之四五”^{[3](6)}。而老牌的《四明日报》为了要和《时事公报》竞争，也曾经有过一些革新，但终究由于其“编辑人员都是年老的保守派，所以形式上虽有些改革，而内容上并无出色的改变，销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从1000份以外减少到1000份以内。”^{[3](7)}这一时期，宁波第一个新闻通讯社——宁波新闻社也于1925年1月成立。

总之，从“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宁波的新闻事业在轰轰烈烈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并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这主要表现在：（1）创办报刊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它由外国传教士、地方士绅、资产阶级同盟会会员为主的办报主体，转为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各界人士所组成的各种组织团体、政党为创办报刊的核心力量；（2）各种组织团体、政党所办的报刊已发展成为三种阵地：一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化阵地；二是成为各政党组织宣扬其政治主张，干预社会发展的舆论阵地；三是这一时期的进步报刊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舆论阵地，其中《宁波评论》、《火曜》等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刊物，成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先锋力量；（3）在宁波的新闻史上，国共两党第一次携起手来在宣传国民革命的舆论阵地上结成了统一战线；（4）《时事公报》开始替代《四明日报》成为宁波民营商业性报业的龙头，同时“宁波新闻社”的成立也使近代宁波的报刊事业在本地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体系。这些发展特点都足以说明宁波的新闻事业在1919年5月至1927年4月进入了兴盛期。

三、1925—1949年的宁波新闻事业

（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宁波新闻事业（1927—1937年）

1. 宁波市、县两级国民党机关报的建立

从1927年4月到1937年7月,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其宣传力量,加强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当时,《余姚民国日报》和宁属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机关报,如《奉化新闻》、《宁海民报》、《慈溪公报》等在1929年至1935年相继创办。受国民党控制,大肆鼓吹反共主张的《宁波大报》于1934年9月创办。这表明国民党在宁波域内建立了由其严密控制的新闻传播网,占据了社会舆论的统治地位。

2. 宁波民营商业性报纸的新发展

首先,新的民营商业性报纸在宁波不断涌现。1928年11月,宁波报人袁关福创办了《商情日报》;1932年3月金梦麟创办了《宁波商报》;尤其是1935年的一年中,宁波就有《明州报》、《宁波鸣报》、《宁波新闻报》、《四明日报》、《商业周报》、《大报》等问世。这些商报均以报道国内外电讯、本土新闻、商业行情和广告启事等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宁属各县的商业性报纸也层出不穷。在镇海有《镇海报》、《新闻公报》、《镇海民报》等;在慈溪有《慈溪民众》、《新慈溪报》、《慈溪市报》等;奉化有《奉化报》等;在宁海则有《宁海周报》,象山有《石浦公报》、《象南民报》、《石报》和《象南新闻》等。以上各种报纸存世的时间大多不长,它们或因经费支绌、经营不善而停刊,或因非议国民党、出现“赤化”而被查封。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宁波的民营商业性报纸比起前一时期有了发展。这说明当时宁波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商业性报纸来传递商情市声,报道国内外形势和本地新闻,这就给宁波民营商业性报刊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其二,以《时事公报》为首的宁波商业性报纸为了与《宁波民国日报》和国民党控制下的报刊进行竞争,不断地在新闻报道和报业经营上下功夫,在舆论控制的夹缝中求得自身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时事公报》社长金臻庠坚持“为民众作喉舌”的办报方针,能客观地反映普通民众的苦楚和愿望。他重视新闻报道的快速、准确,重视对本报独有新闻的奖励,并在本市新闻中另辟“商情”专栏,及时报道市场行情、交易所买卖等情况。这使得《时事公报》的发行量不断上扬。据记载,1927年,《时事公报》“每日平均销数3271份”,到1935年,“每日平均销数4133份”^[4]。1936年底《时事公报》还建立了电讯室,能抄收国民党中央的B种新闻稿。这使《时事公报》对国内外新闻的报道更加及时,内容更加丰富,更受人欢迎,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明显增加,报社的人员增加,规模进一步扩大。^[5]

其三,名目繁多的各种专业报刊和休闲性小报纷纷涌现,这些专业报刊和休闲性小报是当时宁波民营报刊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专业报刊来看,主要是文艺类专业刊物。如:《绿野》文艺月刊(1930)、《出路》文艺半月刊(1931)、《宁波文艺》月刊(1934)、《垦荒》新文学月刊(1934),1937年又有《新篁》、《小战士》、《新生》等文化刊物相继出版。与此同时,宁波各种形形色色的休闲性小报也层出不穷。如《小阳秋》、《闻闻》(1928);《社会》、《宁波午报》(1930);《星聚》、《宁波时报》(1931);《宁波闲话》、《珍报》、《紫光报》、《小花园》(1932);《大晚报》、《宁波大公报》(1933);《中南日报》、《可报》(1935)等。20世纪30年代前期宁波专业报刊和休闲性小报的大量出现是宁波近代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宁波市民文化不断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此外,这一时期宁波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也趋活跃。主要有《宁波三日刊》(1927年9月由郑伯坝、李远鉴创办)、《上海宁波日报》(1933年8月由张静庐、洪雁宾创办)等。这些报刊均以报道宁波新闻、沟通旅沪同乡消息为宗旨。

3. 广播电台、新闻通讯社在宁波的出现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上海兴起了一股兴办私营电台的潮流,由于宁波当时在政治、经济、文化、亲缘等各个方面与上海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用收音机来收听上海的广播在宁波开

始成为一种时尚。这使广播电台在宁波的建立具备了传播基础。1932年5月，宁波业余广播爱好者潘也鲁安装了0.5瓦发射机，在砖桥寓所试办无线广播。^{[2](66)}同年，在宁波和义路口经营电器的“上海电料行”老板袁士川为了扩大电器生意影响，在商店楼上办起了一座试验性的“黄金广播电台”。^[6]1935年，林肯堂等在冷静街又开办起一座“四明广播电台”。由于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和其他方面的原因的限制，这些电台存世时间短则数月，长则二三年。这些广播电台，以播放娱乐性文艺节目和商情为主，四明广播电台也播放新闻性节目。

与此同时，宁波的新闻通讯社也有了新的发展。1935年4月，翁农如、李敬梁等开办了“大通新闻社”。同年8月，象山通讯社创立。这些通讯社存在的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它的出现，既是当时宁波民营报刊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宁波报刊业发展的结果。

总之，20世纪30年代前期广播电台、新闻通讯社在宁波的出现与发展是宁波新闻事业的一大进步。报刊、广播电台、通讯社三位一体，构成了宁波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格局。

（二）抗战时期的宁波新闻事业（1937—1945年）

1. 宁波抗日救亡报刊的兴起与沦陷前的新闻媒体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与上海有着深厚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宁波就深受影响，各界群众的爱国情绪顿时高涨，抗日后援工作蓬勃开展，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骤然兴起。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1年宁波沦陷前夕，宁波市区和各县先后出现的抗日救亡报刊达48种之多，并表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这是在宁波掀起的一场有组织的全民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主办这些报刊的主要是抗战兴起后宁波各县、各界组织起的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与宁波在大革命时期的报刊活动相比，这次报刊活动的受众面更广，它不仅面向社会各界，而且还对妇女、少年儿童进行了爱国主义和抗日救国的教育。

第二，中共党组织和党员在宁波抗日救亡报刊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37年10月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成立后，非常重视运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因此，在宁波的抗日救亡报刊中，有些是国共两党合作开展抗日宣传的结晶，有的则是在中共党组织或中共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创办的。譬如，1937年11月创办的《野战》，是国共联合建立的抗日游击武装“飞鹰团”的团刊，其创办人是中共党员朱鉴。

第三，宁波的有些抗日救亡报刊不仅在当地发行，而且还寄往延安等地，故其鼓动抗日宣传的影响力已超出了宁波本土。如1938年5月，由奉化进步青年胡华等创办的《战时大众》不仅为当地群众所喜爱，而且还得到毛泽东来自延安的亲笔表扬信。

第四，尽管当时国共两党已实行第二次合作，但在抗日救亡的宣传中，国民党反动派仍害怕“赤化”，对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宣传，或由中共党员创办的抗日报刊进行了限制或取缔。如1938年3月，“飞鹰团”被国民党当局俞济民强令解散，《野战》在出刊2期后也为国民党所接收，改名《迅雷》；《战时大众》也遭国民党奉化当局的干涉而停刊。

与宁波沦陷前抗日救亡报刊轰轰烈烈的创办相呼应，宁波的新闻媒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宁波民国日报》等国民党政党报刊以民族大局为重，暂时收敛起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捍卫民族主权的宣传之中。

其二，利用广播这种新媒体进行抗日宣传。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宁波地方政府为了顺应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潮流，于1938年在四明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办起了鄞县县府广播电台。电台在当时为唤起宁波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促进抗日斗争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以《时事公报》为首的宁波民营报纸也大力鼓吹救亡图存，积极宣传抗日，及时报道抗战形势和前线将士的抗日事迹。为大力宣传抗日救国，金臻庠还将副刊《珊瑚网》改名为《挺进》。《宁

波商报》也于1937年10月起,开办短波电讯,报道抗战消息,并增辟“抗战”、“抗战民众”栏目,加强抗日宣传。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宁波的新闻媒体和各种抗日救亡报刊在宣传抗战,服务抗战工作,报道抗日战讯,慰劳和激励前线将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1942年夏,中共浙东区党委建立了接收延安新华社电讯的新闻电台,将接收的新闻电讯选编成《电讯稿》,这标志着浙东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在战火中诞生。从1942年至1945年,浙东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艰难创业阶段(1942年7月至1943年11月);二是反顽坚持阶段(1943年11月至1944年3月);三是走向胜利阶段(1944年3月至1945年10月)。期间,浙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了《时事简讯》(1942年7月出版)、《浙东报》(1943年6月试刊)、《战斗报》(1943年8月创办)、《新浙东报》(1944年4月创刊)等。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是抗战时期宁波新闻史上最光辉的部分。尽管当时根据地的环境十分恶劣,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其所办的抗日救亡报刊始终坚持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方针;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坚持敌后抗战,获取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宁波沦陷后的国民党新闻事业

宁波沦陷后,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坚持与日寇展开游击战,而且在艰难的条件下,宁波国民党政府机关在宁海、天台一带坚持敌后抗日宣传工作,尤其是作为国民党鄞县县党部的机关报——《宁波日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成为宁波抗日救亡新闻宣传工作的中坚力量。它不仅及时报道了宁波本土的战讯、时事,而且也非常关注国内、国际的形势,经常发表对时局的评论。

除了报刊,宁波敌后的新闻工作者还创办有各种通讯社。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新潮通讯社”,在抗战期间,它与浙西“民族社”、浙南“建国社”鼎足为三,深受当时报界的信任。

(三) 解放战争时期宁波的“两极”新闻事业(1945—1949年)

1. 动荡时局和高压管制下的宁波国统区新闻传播业

抗战胜利后,宁波的新闻传播业在总体上有所恢复。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至1949年全市包括各县共有报刊50余种,先后出现16家通讯社”^{[2](42)},3家广播电台。但由于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萧条,加上国民党政府对新闻传播实行高压的管制政策,宁波新闻传播业呈下滑之势,并在1948年以后迅速走向凋敝。这种每况愈下的新闻传播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民党宁波政府机关报《宁波日报》由盛而衰,由衰而败。抗战胜利后,《宁波日报》于1946年春,改由国民党鄞县县党部主办而进行改组。但由于主力人员流失,经营不善,时局动荡,经济困难,报社一度出现亏空负债、人心涣散的局面。1947年秋《宁波日报》濒临倒闭,由沈友梅任社长对《宁波日报》报业实行改革,一度起死回生。但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崩溃离析,《宁波日报》终于在1949年5月23日宁波解放前夕撤往定海,定海解放又迁往台湾。

二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新闻管制、动荡的时局和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宁波的民营报业举步维艰,恢复艰难,有的被迫停刊,有的惨遭查封。1945年9月,《时事公报》以《宁波时事公报》之名复刊,重新成为宁波报业的领头羊。但国民党当局却处心积虑,伺机对之实行政治打压。1948年10月24日,浙江省保安处长竺鸣涛抓住《宁波时事公报》报道失实的把柄,以“造谣惑众”的罪名,责令其停刊。同样,因报纸言论“失检”而停刊封闭的还有《宁波商报》和《宁波晨报》等。此外,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刊的有《宁波晚报》等。至宁波解放前夕,宁波的民营报刊已所剩无几。

2. 浙东游击根据地的新闻传播业

在解放战争期间，浙东游击根据地，于1947年至1949年2月，先后办起了《新华电讯》、《四明简讯》、《浙东简讯》、《战斗报》等报刊。在解放战争时期，坚持斗争在浙东游击根据地的中共浙东临委在紧张、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始终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不断加强对党报工作的领导，重视新闻舆论在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创办《浙东简讯》的过程中，中共浙东临委宣传部号召各级党委加强对党报的学习和研究，并联系自己的实际工作。同时，还特别指示：要“发展与培养大量的人民新闻工作干部”，“责成各级党委给记者以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的领导、帮助和照顾”^[7]。浙东游击根据地党的新闻队伍建设的加强，为宁波解放后建立人民的新闻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

3. 宁波国统区的“反蒋”新闻斗争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战斗在宁波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在新闻战线上开展了各种“反蒋”的新闻斗争。他们在宁波国统区开辟浙东根据地中共党报的地下传播渠道；利用合法的新闻媒体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和新闻斗争。如1947年秋中共宁波地下党组织指示地下党员葛堂槐利用担任“正风通讯社”宁波分社社长，后担任通讯社副社长的契机，组织起一支新闻报道队伍，深入敌人要害部门进行采访，开展党的地下情报活动；同时，还积极争取宁波新闻界的开明、进步人士，开展有策略的“反蒋”斗争。《宁波时事公报》复刊后，中共宁波地下党指派专人做金臻庠的思想工作，使之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间接指示和教育，在办报上走出自己的路，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此外，中共地下党还组织、领导学生创办进步学生刊物，如《燧火》、《曙光》等。这些刊物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了进步的思想和文化，使青年学生看到光明与希望。

解放前夕，宁波新闻界的开明、进步人士也与反动当局的新闻封锁和新闻管制展开斗智斗勇的抗争。当时，《宁波日报》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报务员反对内战，经常将收自“新华社”的电讯戴上“中央社”的消息头，曲折地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宁波的民营广播电台也同情中共，拒绝与反动军队合作。1949年2月《宁波晨报》创办后，连续报道人民解放战争神速发展的形势，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的各种现状，并以犀利的言论，抨击反动当局，最终被国民党宁波城防指挥部武力查封。

解放战争时期宁波的“两极”新闻事业及其斗争，最终以1949年5月20日宁波的解放，宣告国民党新闻事业在宁波的彻底失败。6月1日，《宁波新华电讯》的出版，标志着宁波从此开始了人民的新闻事业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 [1]王玄冰. 我当《四明日报》副刊编辑的一段经历[Z]. 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1993. 36.
- [2]何守先. 宁波新闻纵横[M]. 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
- [3]庄禹梅. 宁波报刊史略[Z]. 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1993. 6.
- [4]陈训正,马瀛. 鄞县通志·政教志[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1604.
- [5]周康靖. 三十年代的《时事公报》[Z]. 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1993. 53-54.
- [6]葛广俊.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宁波广播事业[Z]. 宁波文史资料,1987. 123.
- [7]佚名. 中共浙东临委宣传部关于加强《浙东简讯》工作的通知[Z]. 周律之. 宁波报刊史,182.